

# 作为历史记忆的北京

## ——“五方杂处”说北京之四

陈平原

感慨“北京学”之不受重视，说的不是新闻界，也不是文学界，而是史学家。“旅游热”里的北京，比如胡同游、风味小吃，比如保护四合院、重建城墙，还有老舍茶馆的曲艺、正乙祠的京剧，以及电视台之推介名胜古迹、出版界的展示“旧京大观”等。诸如此类的活动，当然也有专家介入，但学院派似乎不肯再往前走一步，将其转化为学术课题。

前几年江苏美术出版社顺应怀旧思潮，推出《老城市》系列，其中《老北京》一册被指责为硬伤多多（参见危兆盖《〈老北京〉硬伤举例》，载《中华读书报》1999年4月14日）。出版社很聪明，马上发表公开信，感谢批评，并称正抓紧修订，将与第二、第三部合成三部曲一并推出，相信“会让读者更加满意的”。也就是说，以下的更精彩，更值得选购——由检讨一

转而成了广告，实在妙不可言。其实，问题出在作品的定位上：“这套书的文字和说明应该是鲜活的、生动有趣的，通俗易懂的而又散文化的。”（参阅江苏美术出版社致危兆盖的公开信，载《中华读书报》1999年4月28日）这似乎是通例，出版社都更愿意将诠释都市的责任交给文学家，而不是史学家。倘若用的是文学笔法，又不肯下史学的功夫，其谈论历史悠久的“老城市”，很容易华而不实。

前两年，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，我提到北京作为城市研究的巨大潜力。西安作为古都，上海作为新城，都有其独特的魅力，可北京横跨古今，更值得深入研究。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，美国加州大学等学术机构通力合作，使得“上海”成为欧美汉学界的热门话题。上海开埠百余年来，其“西学东渐”的足迹十分明显，历史线索清晰，

1958年拍摄的北京正阳门



理论框架也比较容易建立。可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说,上海其实是个特例。相对来说,作为古老中国的帝都,加上又是内陆城市,北京的转型更为痛苦,其发展的路径也更加曲折,很难套用现成的理论。读读西方关于城市研究的著述,你会感到很受启发,可用来研究北京,又总有些不太适用——在我看来,这正是北京研究的潜力所在。“北京学”必须自己摸索,因而更有理论创新的余地——这里所说的,乃理想的境界。

我所关注的“北京学”,不是古已有之的南北学术歧异,或者二十世纪蔚为大观的京派海派之争;也不是柯文(Paul A. Cohen)《在中国发现历史》(北京:中华书局,1989)所描述的美国学界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崛起的“中国中心取向”的第二个特点:“以区域、省份或是地方为中心”展开考察与论述(142—152页)。关

于京派小说的艺术成就,或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,目前在国内外已有不少研究成果。我更关心的是作为“都市想象”的北京。

都市研究可以注重历史地理,比如侯仁之先生的众多研究成果(参见侯仁之主编《北京历史地图集》,北京出版社,1988;《侯仁之文集》第二部分“城市历史地理研究”,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8),也可以侧重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,社会与人口变迁等。侯先生大名鼎鼎,不用我多说,这里想推荐的是两部相对年轻学者的著述,一是史明正的《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——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》(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5),讨论二十世纪前三十年北京的街道铺设、排污管道、供水照明交通等市政建设方面的问题;一是韩光辉的《北京历史人口地理》(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6),讨论从辽代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北京的户籍制度、人口规模、人口增长过程与人口控制等。此类专业著述目前数量不多,据说北京出版社有志于此,准备以“北京学书系”的形式,陆续推出文史方面的撰述,走出纯粹的文献整理与怀古感慨。

北京是个有历史、有个性、有魅力的古老城市,正迅速地恢复青春与活力,总有一天会成为像伦敦、巴黎、纽约、东京那样的国际性大都市。观察其转型与崛起,是个很有趣味的课题。施坚雅(G. William Skinner)在《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》(北京:中华书局,2000)里说,中世纪的长安、开封、杭州,都曾是世界最大城市,南京和北京也都有此光荣。“南京在明太祖改建后的十年左右,赶上开罗成为世界最大城市,至十五世纪某一时期为北京所接替。除了十七世纪短时间内亚格拉、君士坦丁堡和德里曾向它的居首地位挑战外,北京一直是世界最大的城市,直到1800年前后才被伦敦超过。”(32页)。城市不是越大越好,私

心希望北京成为像伦敦、巴黎那样适合于人类居住而又能吸引大量游客的“历史文化名城”——首先是对于本地民众的精神与物质需求的满足程度,而后才是对于投资者与观光客的吸引力。施坚雅此书中译本的出版,整整迟到了二十年。可这也有好处,那就是我们有了观察的距离与评判的能力,对其热衷于使用计量方法,突出城市研究的社会性与经济性,而相对忽略城市的人文性,会有所反省。

近年翻译出版的西方关于城市研究的著作,主要集中在建筑方面,比如我手头有的意大利学者L.贝纳沃罗(Leonardo Benevolo)的《世界城市史》(北京:科学出版社,2000),以及美国学者凯文·林奇(Kevin Lynch)的《城市意象》和《城市形态》(华夏出版社,2001)。建筑作为凝固的历史,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有用的信息。解读古老的教堂(宗教)、宫殿(政治)、城堡(军事)、市场(经济)、学校(文化),以及连接外部世界的港口与桥梁,确实能让我们贴近历史;可倘若没有“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”这样物是人非的凄婉故事,单是一堆石头,无法激起读者强烈的好奇心与想象力。也许是出于私心,我希望将建筑的空间想象、地理的历史溯源,与文学创作或故事传说结合起来,借以呈现更具灵性、更为错综复杂的城市景观。若陈学霖的《刘伯温与哪吒城——北京建城的传说》(台北:东大图书公司,1996)之以史学家素养处理一则表面看来荒诞无稽的传说,将民俗学、人类学、社会学和宗教学等眼光重叠起来,虽然结论“传说所见大小传统的交融”并没多大震撼力,但其选材之巧妙,以及步步为营的论证,还是很令人愉悦。③

(责任编辑 晚晴)

作者系北京市政协委员  
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

